

后现代语境下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

苗兴伟*

[摘要] 就性别身份而言,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生物决定论和性别划分的二元对立。本质主义认为,性别身份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先天遗传的结果。与此相反,建构主义把性别身份看作是话语建构的过程。在后现代语境下,性别身份是人们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通过在词汇语法系统中的选择建构的。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生产和再生产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本文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话语中存在的性别偏见和不平等的性别关系以及语篇中隐含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从而有助于从根本上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

[关键词] 性别身份;话语建构;后现代语境;批评话语分析

一、引言

通常认为,身份是个体所独有的区别性标识或群体所拥有的同一性特征。一方面,身份强调独特性,因而体现为个体有别于其他个体的可识别特征;另一方面,如果不同的个体具有同一性特征,身份就会体现为个体与特定社会群体的认同。^①就性别身份而言,一般认为,性别是由基因决定的,一个人的性别身份是先天遗传的结果,是固定不变的。既然如此,性别身份问题似乎没有研究的必要。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性别和性别身份问题成为社会学、心理学、文学和语言学等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后现代语境下,社会研究领域的传统性别观遭到了社会建构主义的质疑。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的性别不完全是由生理决定的,而是通过人类的互动和社会生活被不断地建构和再建构的。^②在语言学领域,人们不仅关注语言与性别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语言在性别身份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拟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方法探讨后现代语境下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问题,以揭示中国当代话语在性别身份的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话语建构背后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导致的性别歧视问题。

* 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00875。

① S. Strauss & P. Feiz, *Discourse Analysis: Putting Our Worlds into Words*, London: Routledge, 2014, p. 285.

② 刘保、肖峰:《社会建构主义:一种新的哲学范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84页。

二、性别身份的建构主义视角

语言与性别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许多语言中存在性别范畴自不必多说,对性别的语法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对希腊语中性别范畴的研究。现代语言学注重从语言使用的角度研究语言和性别之间的关系。早期的语言与性别研究主要有三个观点: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①②}缺陷论所关注的问题是女性语言是否是柔弱的、不足的、有缺陷的。丹麦语言学家Otto Jespersen早在1922年就曾指出,与男性语言相比,女性语言是有缺陷的。^③Robin Lakoff认为,女性的“柔弱”语言反映并保持了女性在社会中的附属地位。^④支配论关注的是男性和女性在言语风格上的差异是否由性别不平等和男性对女性的支配引起的。支配论致力于揭露语言中的性别偏见并把性别偏见的根源归咎于男性在社会秩序中的支配地位。^⑤差异论则认为,男性与女性在语言使用上存在差别,这是因为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被赋予了不同的性别角色。^⑥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在二分的、本质主义的性别划分基础之上的。本质主义的性别观渗透于整个西方传统父权制文化中,其核心思想是:男性与女性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且这种性别差异是生物决定的而不是文化决定的现象;性别差异是本质的、普遍的、二元对立的及持久的。^⑦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社会建构主义把性别看作是建构的结果,并试图对性别进行重新界定。早在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女性主义经典之作《第二性》中指出,“女性非为天生,而是后天变成的”^⑧。波伏娃探讨了“男支女配”的文化现象并阐发了女性身份的建构思想,^⑨同时对父权制社会将女人定位为“第二性”的传统提出了挑战: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没有自主性的、与男人相对立的次要者、被定义者。^⑩受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英语中本来表示语法性别的“gender”一词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广泛使用,与原来表示自然性别的“sex”一词有了不同的分工。“gender”来自法语,其拉丁语词源“genus”的本义是“类属”。一般情况下,“sex”用来表示生理性别或自然性别,“gender”则用来表示社会性别或文化性别。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生殖系统和生殖角色是由自然性别决定的,而女性花更多的时间抚养孩子则是社会性别差异的结果,因为女性与抚养孩子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将二者联系在一起并将这种联系自然化的是意识形态的运作。^⑪

社会建构主义导致了性别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主义性别研究的代表人物Butler提出了性别身份的展演论(performativity),把性别看作是身体的重复程式化,是根据一定的文化规训通过重复性地实施特定的行为而不断被确认和展现的过程。^⑫用来界定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文化规训也是由历史和社会建构的。在后现代语境下,性别身份不是自然性别差异的固定产物,而是一个流动的、

①P. Baker, “Discourse and Gender”, in K. Hyland & B. Paltridge (eds.), *Continuum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2011, pp. 199—200.

②P. Simpson & A. Mayr, *Language and Power: A Resource Book for Student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17—21.

③O. Jespersen,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22.

④R. Lakoff, *Language and Women's Pla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5.

⑤D. Spender, *Man Made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1980.

⑥D. Tannen,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al Discourse*, London: Virago, 1990.

⑦郭爱妹:《社会性别:从本质论到社会建构论》,《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⑧[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第304页。

⑨王楠:《美国性别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⑩刘传霞:《被建构的女性》,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6页。

⑪S. Mills, *Gender Matters*, London: Equinox, 2012, p. 7.

⑫J. Butler, *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Subversion of Identit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 33.

被不断建构的过程。^①在语言学领域,建构主义遵循了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思想,反对结构主义所坚持的能指与所指的对立以及重能指轻所指的倾向。后结构主义认为,意义具有不确定性,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语言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现实。在后结构主义的影响下,伴随着后现代思潮中出现的话语转向,女性主义语言学(feminist linguistics)运用批评话语分析和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性别和性别身份的建构,揭示话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及其背后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②女性批评话语分析(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解放和变革为目的,对维持父权制社会秩序和不平等性别关系的话语进行了批判。^③女性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feminist poststructuralist discourse analysis)则通过话语的定性分析,研究女性的主体定位,倡导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④

话语在性别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在语言交流和语言使用的过程中,不断地建构着自己或者他人的性别身份。Jones运用教堂婚礼仪式中牧师的言语选择说明了话语是如何建构现实和身份的。^⑤人们在使用语言表征现实时,其实是在建构现实,因为不同的言语选择所建构的现实也是不一样的。在传统的婚礼仪式上,牧师可以用“I now pronounce you man and wife”或者“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来宣布新郎和新娘的结合。两种不同的表达所建构的性别身份是不同的。前者运用“man and wife”建构了不平等的性别身份,因为“man”是一个社会角色,而“wife”是一个由婚姻关系界定的性别身份。为什么女人结婚后就变成了“wife”而男人结婚后仍然是“man”?为了避免这种具有性别主义色彩的性别身份建构,牧师如今会选择“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因为“husband and wife”所建构的性别身份是平等的,即“husband”和“wife”都是由婚姻关系界定的性别角色。牧师宣布了新人的结合之后,会紧接着对新郎说“You may now kiss the bride”。从及物性的角度看,这句话将新郎和新娘表征为“kiss”这一物质过程的不同参与者:新郎是过程的“行为者”,新娘是过程的“目标”。也就是说,新郎是动作的发出者,是过程的主动参与者,新娘是过程的影响对象,是被动的接受者。这一表达一方面体现了传统观念中人们对性别角色的期待,另一方面也同时建构了不平等的参与者角色。如今,牧师一般用“You may now kiss each other”来替代“You may now kiss the bride”。前者通过相互代词“each other”建构了平等的参与者角色和性别身份。

话语中广受诟病的性别歧视和不平等现象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已经逐渐消失,但很多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根深蒂固,时常以不易觉察的方式出现在各种形式的话语中,建构和再建构着不平等的性别身份。Wharton对英国学校的大型分级读物“牛津阅读树”(Oxford Reading Tree)进行分析后发现,虽然读物中没有明显的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故事中的男性和女性人物角色的数量也是相同的,但男性人物角色无论在出场频率还是施事者角色上都占主导地位。^⑥这说明,话语在建构性别身份时,往往是以含而不露的方式达到建构效应,并以此潜移默化地生产和再生产着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三、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

语言具有表征经验的功能,但经验中的各种范畴和关系并不是自然“赋予”的结果,语言并不是

①J.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London: Routledge, 1993.

②K. Harrington, et al., *Gender and Languag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③M. M. Lazar (ed.), *Feminist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④J. Baxter, *The Language of Female Leadership*,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⑤R. H. Jones,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2012.

⑥S. Wharton, “Invisible females, incapable males: Gender construction in children’s reading schemes”, *Language and Education*, vol.19, 2005, pp. 238—251.

被动地反映经验,而是以词汇语法为动力主动地建构各种范畴和关系。^①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话语的意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不是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是主动地建构现实。话语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和社会主体与自我的社会定位,这是话语建构效应的体现。^②就性别身份而言,建构主义反对本质主义的生物决定论和性别身份划分的二元对立。性别身份是话语建构的过程,语言使用被看作是决定个人和群体身份的参数。^③总之,人们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通过语言使用,建构了自我和他人的性别身份。在语言的层级系统中,建构过程最终是通过语言使用者在词汇语法系统中的选择实现的。

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在大众语篇中最为常见,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女性化妆品广告。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化妆品广告在宣扬女性美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建构了女性的性别身份。例如:

- (1) 常用***,令您秀发如云!
- (2) **,可使您青春常在,容貌更艳!
- (3) 柔美皮肤,从**开始。
- (4) 用不着羡慕别人,**会使你容貌出众。
- (5) 苗条天姿,来自**!

在(1)一(5)这一组广告中,女性美被物化为广告中所宣传的美容效果:秀发如云、青春常在、容貌更艳、柔美肌肤、容貌出众、苗条天姿。女性美被商品化的动因除了商业利益之外,社会对女性身份的期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与社会对男性性别身份的期待相比,为什么社会对女性的外表和容貌的期待如此具体而又严苛?原因就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女性化妆品广告通过女性美的商品化,建构和再建构着不平等的性别身份。化妆品广告通过强调女性追求外表美的必要性对读者进行定位,再生产了男性和女性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为不存在相对应的同样强调男性追求外表美的话语。^④

从女性化妆品广告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汉语中存在大量描写女性美的词语,这些词语常常以碎片化的方式,从头到脚,从内到外,强调女性美的不同方面,从而形成了过度词汇化现象(overlexicalization)。当今社会,人们习惯用“美女”称呼女性,“美女”的同义词和近义词俯拾皆是:美媚、靓女、淑女、美人、佳人、佳丽、红颜,等等。而且“美女”常常与某一社会身份或职业相联系,产生了“美女作家、美女教授、排球美女”之类的表达方式。这种过度词汇化现象建构了什么样的性别身份呢?Fowler和Kress最早注意到了过度词汇化的范畴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⑤。当语言中出现大量用来指称同一个事物或经历的词语时,这种语言现象一方面体现了人们对所指对象的关注和重视,另一方面以范畴化的方式将语言秩序强加给了人们的外在经历。“美女”的过度词汇化体现了社会对女性外表美的高度关注和对女性美的期待,这种关注和期待又使女性美变成了对女性进行范畴化的标准。性别表达的过度词汇化反映了社会对性别身份的期待,同时也建构和再建构了性别身份,生产和再生产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与过度词汇化相似的一个语言现象是再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如“巾帼”和“须眉”就是对女性和男性的再词汇化。再词汇化也是范畴化的重要手段,可以使语言使用者从不同的侧面或角度对事物进行分类。典型的再词汇化包括委婉语和隐喻表达。隐喻在性别身份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①M. A. K. Halliday & C. M. I. M. Matthiessen, *Construing Experience through Meaning*, London: Cassell, 1999.

②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1992, p. 64.

③T. Omoniyi, "Discourse and identity", in K. Hyland & B. Paltridge (eds.), *Continuum Companion to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Continuum, 2011, pp. 260—276.

④K. O'Hallora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Language Cogn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

⑤R. Fowler & G. Kress, "Critical linguistics", in R. Fowler, B. Hodge, G. Kress & T. Trew (eds.), *Language and Contro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pp. 185—213.

用。例如,当女性被再词汇化为“尤物”、“国色天香”、“出水芙蓉”、“小家碧玉”时,都经历了隐喻化的过程。隐喻基于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性通过概念域之间的映射关系,产生隐喻的表达方式,从而限制了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定位。在这个意义上,以隐喻的方式对女性的再词汇化将女性识解为可以玩玩和欣赏的物品,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女性身份的物化,固化了人们对女性身份的刻板印象。

与过度词汇化和再词汇化相反的一个现象是欠词汇化(under-lexicalization)。欠词汇化指的是语言中由于缺乏表达某种经历或事物的词语所形成的词汇空缺。例如,“女色”指的是女性的美色,《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女色”一词而没有收录相对应的“男色”。百度搜索结果显示,“男色”指的是对同性或异性具有吸引力的男性美色。即便有“男色”一词,其意义与“女色”并不完全对应。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期待是不一样的,如果男性在长相或气质上像女性,就会被称作“女气”。汉语中却没有“男气”一词来指女性在气质和长相上与男性相像。“小三”是对插入他人家庭或恋情的第三者的蔑称,一般指女性,而男性的第三者则缺乏相应的词语。丈夫“惧内”又称为“怕老婆”,这种现象在很多方言中也有专门的词汇,如四川方言中的“耙耳朵”。在我们的社会中难道没有妻子怕丈夫的现象吗?为什么没有与“惧内”或“怕老婆”相对应的词语呢?被命名或词汇化的事物和概念更易被人们熟悉、分类、记忆和分享。^①如果一个事物或经历没有被词汇化,那么就难以表达和把握,因此欠词汇化往往会遮蔽现实。性别身份表征的欠词汇化体现了男性和女性在权力上的不平等关系,建构和再建构了不平等的性别身份。总之,话语实践通过表征事物和定位人物的方式,有助于生产和再生产男性和女性在权力上的不平等关系。^②

四、性别身份建构与性别主义意识形态

自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以来,语言中许多带有“男性自我主义”(male egotism)或“男性沙文主义”(male chauvinism)倾向的语言现象受到了激进的女权运动者的抨击,同时,一些旨在消除性别歧视的折中方案也应运而生。这些方案为消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性别歧视现象仍然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且变得越来越隐性,不易被觉察。性别歧视现象难以绝迹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语言背后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性别身份的建构与性别主义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身份被看作是由主流话语实践和意识形态生产并强加给个体或群体的结果。^③

意识形态是构成社会认知的世界观和对现实世界的表征,是建立和维持权力关系、支配和剥削的手段。^④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具备“自然化”意识形态的能力,并使其变成一种貌似意识形态之外的“常识”而为人们所接受。然而,由于这种意识形态内化于话语之中,并通过各种隐蔽策略表现出“自然化”和“常识性”的特征,所以往往无处不在却又难以令人察觉。^⑤话语中的性别标记现象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例如:

(6)清朝末年,一批官僚为了壮大国家实力,发起了向西方人学习的洋务运动,但最终失败。洋务运动失败后,满清统治阶级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救能力。推翻满清的反动统治,挽救中国命运的任务摆在了每一个中国人面前。许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为发动革命而奔走呼号,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在他们之间,女革命党人秋瑾是最有传奇色彩的一位。

^①G. Kress & B. Hodge, *Language as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79/1993, p. 5.

^②N. Fairclough &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T. A. van Dijk (ed.), *Discourse as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Sage, 1997, pp. 258—284.

^③A. de Fina, et al. (eds.), *Discourse and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5.

^④N. Fairclough,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2003.

^⑤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1992.

(新课标、小学生注音阅读系列《中国历史故事》,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7)李清照(1084—1155):号易安居士,南宋杰出女文学家。以词著名,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声誉。(《济南时报》2007年8月29日)

在例(6)和(7)中,分别出现了带有性别标记的表述“女革命党人秋瑾”和“南宋杰出女文学家”。可以看出,这样的表述出自小学生注音阅读材料和主流报刊,而且读起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孙中山称为“男革命党人”,把李白和杜甫称为“唐朝杰出男文学家”,听起来则不是很自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指称女性时已经习惯了加上性别标记的做法。笔者发现,话语中的性别标记主要有三种形式:

(8)职业或特征+女性:知识女性,经济女性,职场女性,商业女性,华裔女性。

(9)职业或特征+女:农家女,打工妹,烈女,侠女,卖菜女,才女。

(10)女+职业或身份:女村医,女强人,女工,女诗人,女王,女硕士,女博士,女宇航员,女主持,女民警,女记者,女工,女富豪,女首富,女户主,女教师,女医生,女教授,女杰,女政治明星,女立委,女候选人,女飞人,女队员,女乐手,女科学家,女演员,女青年,女设计师,女作家,女高官,女村官,女村长,女革命家,女房东,女徒弟(女弟子),女革命党人,女文学家,女汉子。

女性性别标记在语言中频繁出现,其背后必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这就是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如,在人们的观念和期待中,医生一般是男性,因而很少会出现“男医生”这样的表达,女性成为医生就是超出了人们的期待,所以就需要有性别标记。同样,在人们的观念和期待中,护士一般为女性,因而很少出现“女护士”这样的表达,男性成为护士就超出了人们的期待,所以也需要有性别标记。这就是为什么“男医生”和“女护士”听起来有点冗赘,而“女医生”和“男护士”听起来比较自然。需要指出的是,在某些场合和语境中为了突出性别差异,的确需要性别标记,这应另当别论。当我们称呼某位女士为“女医生”或“女文学家”时,可能并没有性别歧视的意图和目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女性性别标记在语言中频繁出现,其背后必然存在着被常识化和自然化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

话语是意识形态得以传播和再生产的主要活动。^①说话的方式生产和再生产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则通过语法、文体、措辞及语言的其他任何方面的选择被操纵。^②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通过在词汇语法系统中的选择,生产和再生产了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使其在社会认知中根深蒂固,无处不在但又不易觉察。从下面这些例子中可以看出,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是如何隐含在话语中的:

(11)叠起尿布来,须眉不让巾帼。(《齐鲁晚报》2006年3月5日)

(12)母亲像男人一样豪爽,为帮助别人把自己衣服卖了都在所不惜。在山打根也是数得着的老板,虽然她是个女人,其他老板拼命剥削手下的女人,向华人、土人死气白赖要钱,母亲即便是在金钱上有损失也不干那种事,对谁都十分友善。过去出版的一本南洋旅行的书——叫什么名字来着,已经记不起来了,说她是有侠义心肠的女老板。(山崎朋子《望乡》)

(13)七仙女倒追董永,白蛇娘娘倒追许仙,祝英台倒追梁山伯,田螺姑娘倒追谢端。(鼓角临风《语录中国》)

(14)两人这样一唱,围观群众更是如痴如狂,情绪沸腾,七嘴八舌喊道:“看啊!她们还唱歌呢!她们一点都不怕,好勇敢!好伟大!比男人都强!”(琼瑶《还珠格格续集》)

以上话语都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建构了性别身份。例(11)是一个新闻标题,新闻内容是福利院的叠

^①M.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trans. by S. S. Smith, New York: Harper, 1972.

^②B. Johnstone, *Discourse Analysis*, Oxford: Blackwell, 2002.

尿布比赛。这场比赛之所以成为新闻,主要是因为比赛中“须眉不让巾帼”。男性在叠尿布比赛中胜出成为新闻,这是因为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女性更擅长叠尿布,或者说叠尿布本应该是女性所擅长的事情。例(12)中“虽然她是个女人,……”彰显了“母亲”的高尚但也同时暗含了社会对女性的价值评判和期待,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不言而喻。例(13)中的“倒追”也暗含了社会对男性和女性性别角色的定位。女性追求男性是“倒追”,这意味着男性追求女性才是符合人们的性别角色期待的追求方式。例(14)中“比男人都强!”的感叹也暗含了“男人比女人强”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否则这样的感叹就没有意义了。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话语中所隐含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属于社会认知的层面,是一种被自然化的社会观念。与话语中的性别标记一样,不能因为话语中隐含了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认定语言使用者具有性别歧视的意图或者实施了性别歧视的言语行为。但毫无疑问,在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过程中,话语中的性别标记和性别主义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要彻底地消除性别歧视现象,必须彻底消灭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

五、结束语

性别身份不是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而是社会建构的动态过程。话语在性别身份的建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们运用语言资源来呈现并建构自己和他人的性别身份。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具有意识形态效应,话语在建构性别身份的同时,通过语言资源的选择,生产和再生产了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别身份的话语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性别偏见的形成和性别歧视的产生。语言本身并不会歧视任何人,话语所体现的性别歧视在本质上产生于被自然化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在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性别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现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排斥、边缘化和隐形化。性别身份建构研究的目的,就是运用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话语中含而不露的性别主义意识形态,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不平等的性别关系和性别歧视现象。

(责任编辑:邓晓东)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MIAO Xing-wei

Abstract: In contrast with essentialist approaches to gender identity which emphasize the binary opposition based on the genetically determined biological distinction,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regard gender identity as socially constructed in the process of linguistic interaction. In the post-modern context, gender identity is discursively constructed through lexicogrammatical choices in the linguistic system and in so doing discourse produces and reproduces unequal gender relations and sexist ideologies in one way or another. Through the critical analysis of everyday discourse, this study aims to reveal the existent gender bias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 discourse and expose the hidden sexist ideologies underlying gendered discourse, with a view to eliminating gender discrimination from its root.

Key words: gender identity;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post-modern context; CDA